

THE ISSUES, VIEW & PARADIGM IN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SUBJECT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问题、视野与范式

靳书君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问题、视野与范式

靳书君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汪 莹

版式设计：马 龙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视野与范式 / 靳书君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1-015997-3

I. ①马… II. ①靳…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2905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视野与范式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YANJIU DE WENTI SHIYE YU FANSHI

靳书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295 千字

ISBN 978-7-01-015997-3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	3
第一节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考	3
第二节 列宁晚期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探索	5
一、急剧退却中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探索	6
二、再次退却中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探索	16
三、停止退却时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探索	28
第三节 20 世纪早期我国知识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化思考	40
一、旅俄中国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切身观感	40
二、中国知识界对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动因、内容、 前途的研究	43
三、早期研究者对中国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考	49
第四节 从现实基础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视阈	52
一、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主题	54
二、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	57
三、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6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6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	63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扬弃	64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对	66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超越	6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	72
一、一个科学命题	72
二、两项伟大实践	74
三、三条实现途径	76
四、四种发展形式	7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环节	81
一、主题的中国化	83
二、主力的中国化	85
三、主体的中国化	86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	90
第一节 毛泽东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中国化探索	90
一、毛泽东认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路径	91
二、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新经济政策”	93
三、列宁、毛泽东“新经济政策”的区别	98
第二节 从现代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100
一、国共两党的“中国化”主张	10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主题上的历史性超越	10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主力上的历史性超越	104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主体上的历史性超越	10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全球化依附性难题的破解	107
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依附性难题	107
二、促使负面的全球化转向正面的全球化	111
三、推动自发的全球化转向自为的全球化	114
四、引领单向的全球化转向双向的全球化	117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解	119
一、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展难题	119
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解决中国后发展难题的 结构分析框架	122
三、从现代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124
第五节 从中国市场化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131
一、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化陷阱	131
二、解除地主经济对初级市场的束缚	133
三、形成潜在的竞争性经济结构	135
四、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13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创新	14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解释学分析	141
一、现实基础：历史条件的变化形成“理解距离” 及在中国的“应用问题”	143
二、根本途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经典作家依照 “对话逻辑”进行“视野融合”	145
三、最高境界：实现文本普遍意义“具体化”， 在中国产生“效果历史”	148
第二节 中国话语时代化大众化的基石与路径	150
一、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151
二、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152
三、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153
第三节 毛泽东诗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创新	155
一、旧词的美感特质与矛盾	156
二、毛泽东对旧词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158
三、毛泽东诗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境界	162
第四节 习近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实践	167
一、“鞋子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自信	168

二、“钉子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169
三、“笼子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71
四、“扣子论”：全面从严治党的道德底线	172
五、“种子论”：推进“四个全面”的精神依托	174
六、“狮子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世界形象	175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话语创新举要	17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教学话语	17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教学话语	180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教学话语	180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教学话语	18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域经验	183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社会基础	183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价值观	183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	187
三、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社会基础	195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培育路径	200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培育的演进逻辑	200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培育的路径	202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培育的具体渠道	205
四、根据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大众化培育方法	213
第三节 西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文化载体	216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	216
二、融入广西本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9
第四节 抗战时期桂林版《救亡日报》“中国化”话语的文化方向	239
一、化什么：适合中国现代生活改造的新文化成果， 推进文化开放	240
二、谁来化：投身伟大抗战实践的最广大民众， 成为文化根基	242

三、怎么化：融入中华文明发展轨道，实现文化复兴	24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海外研究	250
第一节 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情况	250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	251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根据	252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理	256
第二节 我国台湾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情况	258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社群	25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独特视角	261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26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268
第三节 中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对比	271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	271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	274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机制	280
第四节 西方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范式	282
一、新时期以前研究的主流学术范式	282
二、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及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	285
三、对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借鉴意义	290
主要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1

引言

从2000年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正好赶上我国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很庆幸得到学术界理论界良师益友的太多帮助和启发。在学术大潮的裹挟下，十五年来我始终沉浸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切身感触到这个学术领域从“潜学科”到“显学科”的脉动。“潜学科”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始于延安的知识分子，带有泛政治化倾向；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小高潮，是与“东亚热”相伴出现的，研究者认识分歧很大，缺乏塑造学术范式的公理化基础。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特别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一次作为独立二级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一个学科成熟的基本标志，就是形成和确立自己的学科范式。在这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中，学术界理论界关于问题谱系和基本原理方面的共识增多，尽管距离形成公共话语系统和通用方法论原则尚需时日，但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概念、范畴和话语系统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走向等问题，具备了自觉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式的学术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学术界理论界研究这个使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关键”问题，尽快搭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式，显然符合全面深化改

革的现实要求。

学科范式的核心是打造具有本学科特色的问题谱系、话语体系、公理化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本书聚焦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界研究比较集中的十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渊源、命题、背景、特性、话语、机理、贡献、飞跃、路径、载体等，对这个问题谱系的阐释，尽可能运用已经成为学界最大公约数的学术观点，努力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形成公理化基础的需要。由此出发，本书把对十大问题的研究在纵向上置于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未来超越的长过程中，在横向视野上置于区域实践、中国道路和海外研究的多维度下，力求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①。这一历史主义的研究视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者形成公共话语系统和通用方法论原则提供了基本遵循，希望本书的篇章安排和逻辑结构能够为借鉴海外学术研究范式，追求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式的进一步成熟，保持和发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优势，尽到应有的学术努力。

^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问世九十年后，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命题才被正式提出。但是，马克思辞世不久，恩格斯即着眼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马克思主义中心指导的实际需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领导苏维埃国家转行新经济政策，从实践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思想原则。由于俄国内战，直到1920年冬天，中俄边境交通才得以恢复，中国人最早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就是列宁领导的新经济政策俄国。早期旅俄的知识界人士，延续中国近世思想史“援西入华”的思想传统，对列宁新经济政策进行了许多中国化思考和构想，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取向，对中国共产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产生了直接的先导作用。

第一节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考

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欧美各民族国家的国情越来越带有各自的特点，许多国家成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向恩格斯请求指导。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各国工人运动的

发展，广泛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反复教导各国社会主义者，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和策略。在生命的最后5年中，恩格斯为过去的经典文本作了一系列序言，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恩格斯晚年所作序言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途径，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怎样化”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从书本里发现本国的共产主义，而应该立足于本国实际，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1891年《哥达纲领批判》序言写道，“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所以他认为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这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德国党、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使马克思主义适合德国的实际需要。恩格斯对拉法格说，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要是你们只称自己是法国人，倒会取得更大的效果；因为这反映了事实，其中也包含了由此而得出的逻辑结论。只有立足本国实际，才能充分反映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使然。1894年《〈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言提到，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长期以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细节了解得很不够”。在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前，恩格斯拒绝了对俄国问题的发言权。恩格斯认为，要回答和解决一国的实际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参加各国的革命实践，加深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恩格斯不顾年迈，更忙碌地承担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恩格斯的理论工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获得适合本国实践的新的理论认识。

恩格斯晚年所作序言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依靠力量，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靠什么人来化”的问题。1890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指出，《宣言》“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宣

言》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表现出大众化的势头，千百万工人劳动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主要依靠力量。1892年《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分析说：“《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在这里，恩格斯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被广泛传播、接受和理解的最深厚根基，就在于他在利益和价值上代表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

恩格斯晚年所作序言提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根本任务，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为什么而化”的问题。在最后的岁月里，恩格斯多次提到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意大利以及它的标志性人物但丁。恩格斯盛赞但丁，是钦佩他提出了一句响彻整个时代的口号：“走自己的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走出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几乎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批评赫尔岑，“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德国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援引马克思的话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走自己的路，寻找不同于别国的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最高境界。

第二节 列宁晚期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探索

列宁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转入和平建设，是从1920年11月内战结束开始的，是以新经济政策的艰辛探索载入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与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相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

需要从国情出发制定和调整政策,在政策执行中积累和发现经验,及时总结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这是需要倾注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创造性工作。列宁敏锐把握“一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苏维埃俄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相结合,调整和制定符合俄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提升,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1920年11月至1922年5月离岗病休前的一年半,列宁在急剧退却中、再次退却中、停止退却时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进行了三个半年中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探索。正是经过这样三个半年,列宁领导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粮食政策,再进到新工业政策,最后扩大到整个新经济政策。在此过程中,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定位发展变化,完成了从新经济政策措施到新经济政策战略、再到新经济政策体制的逐级跃升,而这个体制就是市场体制,市场关系是列宁晚期把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伟大发现。

一、急剧退却中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化的探索

1920年11月苏维埃俄国摆脱内战,到1921年5月新经济政策被确定为长期的政策,短短半年内,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变。这次退却首先是从余粮收集制转行粮食税政策,为储备工业品交换税后余粮,列宁主张国家无力经营的工矿业对外实行租让制,在这种粮食政策和经营政策基础上,列宁提出“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①这时的“商品交换”尽管主观上想绕开市场,但列宁根据客观形势尊重地方流转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从而在实践上迈出了走向市场关系的第一步。

(一) 应对余粮收集制造成的经济政治危机,适时转行粮食税

余粮收集制、产品配给制、劳动义务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普遍采用的战时政策,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沿袭了沙皇政府、临时政府的战时措

^①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施，列宁最先称之“战时共产主义”，一度被当作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特别是内战时期，全国建立了 2700 个工人征粮队，征粮队员达 82000 名。^① 国家粮食机关还派驻征粮特派员，对拒征农户采用连环保措施，并往抗拒地区派出别动队，征粮队和别动队配有手枪、机关枪等武器装备，甚至有肃反工作人员陪同，强制征收所有余粮，甚至是口粮、种子粮，有的地方出现农民吃树皮、饿死等现象。十月革命后的“头一年征购了 5000 万普特，饥饿、挨冻和贫困现象严重。第二年征购了 1 亿普特。第三年征购了 2 亿普特。每年增加 1 倍”^②。这坚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余粮收集制的信心，1920 年冬内战结束后，征粮定额不降反增，苏维埃政府计划在下年度征粮定额再翻倍，征粮 4 亿普特。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耐心是建立在内战时期同工人的政治联盟基础上的，内战结束后，地主资本家复辟的危险消除了，农民的这种耐心迅速变成对过度征收、征粮队暴行和禁止买卖的不满，纷纷宰杀牲口，拒绝播种技术作物，播种面积大大降低，1920 年的粮食产量仅及 1913 年的一半左右，1921 年的播种面积只有 9030 万公顷，是 1913 年播种面积的 86%。^③ 粮食状况进一步恶化，劳动国防委员会于 1 月 22 日和 30 日先后两次削减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区的粮食配给量。1921 年农村供给城市的食品减少到 1913 年的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因为余粮征集指标没有完成，合作社即使有工业品库存也拒绝供应，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岌岌可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指出：“俄国进入了经济危机时期。”^④ 与经济危机接踵而至的是严重的政治危机，1921 年初全俄国所有省份都出现了农民的武装抗粮斗争，蔓生出 50 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许多地方组织了农民游击队，一些无处安置的复员军人摇身变成游击队员，起义者提出“打倒余粮收集制”和“自由贸易万岁”的口号。在城市，由于开工不足、口粮不足，各地爆发工潮，其中工业重镇彼得格勒工潮尤为严重，罢工工人企图突破自由贸易禁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47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7 页。

③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5 页。

④ [俄]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2 页。

令，向农民购买粮食，对彼得格勒工潮的镇压直接酿成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导火线。起义水兵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是真正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提出“取消征粮队”、“恢复农民自行处理农产品的权利”。这种新的武装对抗被叫作“小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生死抉择：要么重新陷入和 2000 万个体农户的内战，要么放弃余粮收集制。

从颁布余粮征集法令开始，一些政党和人士、农民和工人群众以及党和苏维埃政府内部，就不断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1919 年 7 月 17 日，孟什维克中央在其纲领中提出取消“粮食专政”，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1920 年 12 月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代表唐恩建议在农民完成国税后，可以在自愿的商品交换基础上出售剩余农产品，社会革命党人 B.K. 沃尔斯基说：“当前推行的多拿少留的制度应当改成税收制度。”^①1918 年夏秋，列宁曾提出过粮食税的政策设想，并通过了实物税法令，但内战迫使苏俄于 1919 年 1 月颁行余粮收集法令。整个内战时期，列宁、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和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坚定推行余粮收集制，使这一粮食政策在人民委员会拥有稳定的 3 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加米涅夫、李可夫、尤·拉林一开始就对余粮收集制持保留意见，他们多次要求采取农民能够接受的经济关系，直至恢复自由贸易。1920 年 1 月，拉林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实物税和自由交换，可以说提出了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党的领导核心不同意这种政策变化，会议决议未能公开。次月，托洛茨基在《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提纲中，向中央提出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和产品交换，有了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以 11 票对 4 票被否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和基层工作者，纷纷反映余粮收集制的问题，建议改变粮食政策。1920 年 6 月全俄粮食会议上，库班粮食委员、卡马河流域的粮食委员以及萨马拉的粮食工作者都认为不必害怕自由贸易，建议实行实物税的办法。在余粮收集制小组会议上，赞成向粮食税过渡的决议案得到半数支持，只是由于主席的一票之差没有通过。1920 年夏秋，斯摩

^① 郑异凡：《苏联史·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6 页。

棱斯克省在实践上尝试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做法是早在6月份政府就告知农民向国家交纳粮食和土豆的定额，并承诺绝不多收，结果该省仅用1个月，就完成了别省要拖一年之久的征粮任务。尽管如此，内战结束后直到1921年1月经济危机突然迸发之前，列宁等俄共领导人仍然认定：“农民将按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①声称“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②。当然，列宁不是被意识形态捆住手脚，他比其他领导人有更实际的考虑，一是鉴于1920年11月刚刚结束对弗兰格尔作战，尚不能确定和平建设时期是否真正到来；二是年底余粮收集工作刚刚开始，政策变化难以保证国家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粮食。所以，列宁一方面力求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框架内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12月24日和28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列宁提出公共粮库收集保管种子和对通过奖励刺激农民播种的计划。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当月，即11月30日，他为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决定草案，要求在一周内研究“取消货币税和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这两项工作是否必须同时实施”，并为此任命了专门委员会。^③

农民对列宁投注了最大程度的信赖，即使在起义游击队和水兵当中，他们也避免提及反对列宁的口号。列宁也密切关注农民的真实想法和做法，从1920年3月到1921年3月，粮食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根据农民的申诉向38个省发出了578封函询，农民通过信件和上访的形式向地方和中央的苏维埃政府机关申诉，仅在1920年9—12月就有400份左右。千百万农民申述无力承担层层加码的高额征收，要求规定征粮的明确标准，并事先告知。信中虽然没有直接否定余粮收集制，但具体要求已经接近粮食税的做法。列宁还收到了关于“小新经济政策”成功试验的汇报，同时，他不仅通过信件而且还通过接见农民代表的方式，直接和来莫斯科上访的农民沟通。1921年

①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②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③ [美]路易斯·费希尔：《列宁》，彭卓吾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551页。